

消除“指尖之累” 多听听基层干部怎么说

□ 王石川

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中央重拳。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文指出，要刹住通过数字化手段变相加重基层负担的歪风邪气，减少基层干部在数字时代的无谓劳动，让广大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基层干部消除“指尖之累”，是很多人的共同期待。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指尖之累”不

仅带来身体之累，还带来精神之困。如果整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不仅无益于身体健康，也无益于开展实质性工作。

此次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重在建立长效机制。应该说，此前经过专项整治，已取得阶段性效果，比如有基层干部表示，“最直观的就是手机‘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少了”“盯群、爬楼的情况少了，服务群众的质量也提升了”。

但是，也要看到，消除“指尖之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稍加松弛，就可能出现反弹。为此，就要找到形式主义的问题和症结所在，既要紧盯老问题，也要及时发现新表现，全面检视、靶向治疗。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源头治

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需要思考的是，数字化推进、新技术赋能，给广大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在实践中，为何出现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究其原因，还是一些部门过于注重留痕，过于强化政绩考核，且习惯层层转嫁压力，以及过度依赖“群里来群里去”等。

应该说，留痕并非不可，但不能简单以工作留痕代替实际工作成效评价；推广政务应用程序并非不可，但不能强制推广下载，也不能强制要求定期登录。至于多头填报、重复索要数据，更

是在人为降低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应该被严肃治理。

尽管消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可能一劳永逸，但需坚持问题导向，实现源头治理。中央网信委此次发文就指出，用3到5年时间，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机制，推动实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的贯通联动。换言之，建立健全问题发现、案例移送、责任协同等机制，用好用足专项整治、技术监测、典型案例等工作成果，才能釜底抽薪，更好地实现高质量治理效果。

“App刷个遍，问题没解决几件”“忙着‘键对键’，不顾‘面对面’”“‘群里吼’代替‘实地走’”……作为“指尖之

累”的直接“受害者”，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也懂得如何找到更精准的治理突破口。基于此，在治理过程中，还应多听听他们的心声，多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向上向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网信委此次发文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各地提出了新要求也明确了治理路径。只有不打折扣地落实要求，因地制宜地推出治理举措，真正把消除“指尖之累”当成一件大事来抓，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才能让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负担中解脱出来，更有精力去干事创业。

帽子头衔不是衡量人才的最终指标

□ 孙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工作和创新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中国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取得专利数量均位居全球第一。但在成就的另一面，某些“短板”同样不可忽视：我国基础研究世界级贡献不多，科技成果转化不足10%，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存在大量“卡脖子”问题，“0-1”的问题未解决。过去，在跟随式发展、计划式管理、模仿型科研道路下形成的人才评价范式，引导了大量“从1到10”“从10到100”的科研成果，但却未能有效激励“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从这方面讲，传统的人才评价范式已经落后于当前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时代发展要求。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革人才评价范式意义重大。

人才工作不能只追求创新成果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论文、专利、科技奖励、人才帽子头衔数量等，只是人才发展的中间指标而非最终目标。近年来，我国人才量化指标、论文专利数量大幅增长，但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仍显不足。为此，在中央推动下，2022年年底科技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聚焦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开展涉及21家单位和6个地方的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深化此项工作，需要进一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强调人才评价的动态性、领域性、贡献性。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国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人才评价基数逐步抬升，人才评价标尺日趋多元。说起科研人才、技术人才、专业人才时，离不开一定领域、行业和岗位——在特定领域内是人才，换一个领域不一定是人才；彼时是人才，此时不一定是人才。从内部看，人才发展有其生命周期；从外部看，同类人才竞争，不同个体亦有其各自的比较优势。何谓“人才”，怎样评价人才，要围绕“以用为本”，落到具体的领域、阶段、门类、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坚持动态发展观点，以专业实践中的水平、贡献作为评价基点。对应不同的单位机构，应推动建立由其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传导的差异化人才评价体系。

其次，要把握人才评价的目的性、背景性、专业性。对人才评价而言，有多种类型和目的，如职称及专业资格评价、人才计划工程评价、人才奖励及称号评价等；也可以分为潜力型评价、激励型评价、结论型评价等。评价的目的不同，其标准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其中标准的把握，要与评价主体、客体与评价背景紧密结合，这更凸显出“评价能力”的重要性。可以说，脱离专业、产业、生产、科研前沿一线实践的评价者，基本不可能再具备人才评价能力，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具体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人才评价标准也要经受市场、社会和专业的检验。人才评价要坚持“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技术路线。比如，政府的职能优势在于完善评价机制，明确政策导向，而不是制定具体评价标准，主导人才评价过程。否则，评出的人不被社会、领域认可，就会产生评价、使用“两张皮”的尴尬。

此外，要把握人才评价的复杂性、特殊性、内隐性。有研究表明，人才评价中有一个“对数定律”：一流人才评出和带出一流人才，二流人才评出和带出三流人才，三流人才评出和带出四流人才……依次递减。人才评价的“对数定律”告诉我们，要想选育国际一流人才，最重要的是找出具有世界水平的人才来讲，“大师”才能甄选“大师”，而二流和三流人才，往往选出自比更差的人。这启示我们必须找出世界级一流同行，才能真正评出高精尖人才。在这里，关键在于找出“对的人”，而非死卡“硬指标”。对此，施一公院士曾提出：“国际上的办法，是不看论文，看专家”“国际通用的方法是参考国际最顶尖专家的观点”。

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发展路径不是标准化的，不是定制式的，是在相对适合的创新环境下涌现出来的。而人才评价标准是分层、分类、多元、专业的，具体的评价标准也掌握在分层、分类、多元、专业化的专家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要遵循市场法则，推动开放竞争，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充分发挥专业、行业、职业共同体在人才评价中的作用，强化愿景性评价，提出具体性评价，将精力投入到构建开放、多元的人才评价体系上来，让更多的人人才在干事创业和价值创造中脱颖而出、自由涌现。

【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关键问题研究”（22ZDA037号）成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贴标签

近日，有人反映某地旅行社出现不接待记者事件。事实上，此类事件半年前就发生过。部分旅行社明确规定不接待记者、律师等特定行业游客，甚至发展成为行规。旅行社给游客贴标签，是逃避监督的鸵鸟心态。旅游业整顿乱象不能歇脚停步，市场秩序仍待规范。（《经济日报》12月18日）

漫画：徐 简

副教授“跨栏”进校为何引关注

□ 伍里川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随着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有关进出北大校园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再度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李植发文章表示，北京大学现在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权学校使用他人脸识别信息，刷不了脸，进出校门需要门卫查验工作证后放行。因为查验工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会拦截。但最近一天入校时，保安在校园内追了他半天，跑步追上又骑了自行车来追。最后以李植向保安出示工作证结束。而在出校时，他又被门卫拦住要求刷脸，否则不能出校。

李植的“跨栏”行为当然有不妥之处，不值得提倡，但他也是以这种行为表明一种立场。李植指出的问题，实际上分

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高校校门对社会公众的开放命题，另一个是高校对内部人员的出入管理。无论是社会人员的“预约”还是内部人员的“刷脸”，都意味着一些高校的校门并没有变得更开放，反而“收紧”了。

笔者在南京生活工作，几年前，经常和球友一起去南京一些知名高校踢球。那些高校的大门是面向所有人敞开的，并无保安询问，更无保安骑车狂追。我还去大学的课堂旁听过，教师并不觉得突兀。很少有人会觉得大学敞开大门有什么不对。

而从李植“闯门”事件中，我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今，对大学校门半掩半合甚至“名开实限”的情况，很多人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有关大学校门开放与否的争议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反对开放的“声浪”。今年5月，有市民欲进深圳大学遭拒，质问保安“深大是谁的”，不少网友就以“开放会带来不安全”“扰乱课堂秩序”等理由为“拒人”者叫好。此外，也有身为大学生家长的朋友和我言辞激烈地提醒过大学校园开放的

“严重后果”。

在相关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不是大学校门不开放、半开放，而是这种近年来才开始流行的现象，竟然成为一种“存在即合理”，受到很多人的认可。

大学校门开放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这种开放并不等于“不安全”的道理，已经说得太多。在过去技术手段相对欠缺的时代，大学校门的敞开尚不能令治安形势变坏，如今科技如此发达而普及，难道还不足以提供一份安全上的保证吗？

大学为了抵御“社会人”里可能存在的“坏人”，而把所有人都当成检查对象来对待，这种思路和做法，和大学的包容开放精神背道而驰，也部分放弃了其传播常识、共享资源的社会责任。

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让“跨栏”的老师刷脸、刷卡，不再“跨栏”，也不是让想进大学旁听的孩子、想进大学踢球的人被挡在门外，而是开拓思维，在开放校园和维持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安全间取得平衡，让大学校门恢复开放自如的常态。

外卖从天而降：让科技创新在市场浪潮中畅游

□ 高 然

12月19日，美团无人机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开设了首届高校场景的无人机配送航线。据现场体验者介绍，水果榨汁约后6分钟就能送到学校里。

“外卖从天而降”，仅仅在头脑中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就让人有些激动。虽然无人机配送目前还面临诸多障碍，和大规模实际应用还有不小的距离，但第一步已然迈出，人们自然对第二步、第三步充满期待。

实际上，这条高校无人机配送航线的开设有着更加深远的寓意。创新的原点来自市场，在创新过程中，由政府搭台，企业主导，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外卖从天而降”既体现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价值，也论证了让“学以致用”和“烟火气”充分融合，推动学术走进产业市场，推动技术真正落地

应用的意义。

学以致用，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求学处世之道。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术探索滑向玄虚高蹈的情况，使得求学问道能够脚踏实地。这显然是一种健康的求学状态，值得追求、应该提倡。可是很遗憾，一段时期以来，这个优良传统，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阻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就是，很多科研成果难以推广应用，它们的价值只在实验室里，而无法走入现实生活中。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前景分析报告》统计：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应用于实际生产中，能够真正形成产业的科技成果仅为其中的20%。

造成如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科研成果转化推广体制出现了梗阻，企业主导，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外卖从天而降”既体现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价值，也论证了让“学以致用”和“烟火气”充分融合，推动学术走进产业市场，推动技术真正落地

目的，一切都是空谈。

产学研的联合中，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上谁的动力最强？显然是企业。而这正是以往一些科技成果难以落地的症结所在：企业并未被视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科技创新在市场的浪潮中畅游，落地的梗阻才会愈发清晰可见。所以，科技成果要想真正推广落地，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以企业为创新主体，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这些论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学以致用”和“烟火气”充分融合，“学”才能获得“用”的检验和助力。无人机在高校中送外卖，除了技术层面不断突破所创造的价值外，也给技术如何适应于千万化的“场景”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思路。一条航线通过了技术的考验，也成为当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鲜活注脚。

年轻人爱上“阅读社交” 读书可以更有趣

□ 杨鑫宇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一些年轻人开始重拾“文字之美”，他们从浅阅读、快餐式阅读中回归，严肃、经典的文学名著和人文专著重新走红，成为“心头好”。与此同时，年轻人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书籍的数字化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他们打开了“阅读社交”这扇崭新的大门，引领了一股在阅读中分享、在分享中阅读的风潮。（《半月谈》12月18日）

这股风潮不仅让年轻人更愿意抽时间读书，也使阅读变得更加富有乐趣。在网络平台上分享读书感悟，与同龄人在社交媒体上互动……这些行动表明了当代青年对阅读的需求。社交化阅读，不仅仅是阅读形式的变化，也赋予了阅读新的角色与功能。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为社交化阅读提供了技术平台，作为“数字原住民”，年轻人特别容易接受和适应这种阅读方式。与此同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阅读与社交结合起来，更符合读者的心理需求。事实上，阅读不只是读者从书本中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也是读者发挥自身主体性，得出感悟与结论的过程。对于这些感悟，倘若没有交流的渠道，大多数读者都不想敝帚自珍。事实上，“阅读社交”并非全然是一个新现象，只不过在过去往往要依赖读书会等线下活动。今天，通过网络与人交流何其便利，社交化阅读的风潮再度兴起，并不令人意外。

社交化阅读以人为核心，倡导共同创造和多向互动，从而最大化地实现阅读价值。这一过程不仅强调参与和分享，还激发了青年参与社会交往的热

情。多媒体集成的特性，也让社交化阅读有更多的“讨论素材”，增强了社交的有效性。此外，网络时代的社交化阅读，几乎没有门槛限制，这使更多人能够加入到“全民阅读”的队伍之中。

尽管社交化阅读在青年群体中大受欢迎，但也有人担忧，这种阅读方式是否存在弊端。确实，以社交为导向的阅读，可能导致“浅阅读”现象，使部分读者不求甚解，只把读书当作社交的“必要成本”。与此同时，社交化阅读也容易导致读者以“切片”的方式阅读严肃著作，从而影响了阅读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导致误解和庸俗化解读。但是，笔者想要强调：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只有先跨过“开始阅读”这道门槛，才能去谈阅读质量的高低，“深阅读”或许比“浅阅读”更好，但“浅阅读”无疑胜过了“不阅读”。除此之外，碎片化阅读的弊端也并非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克服。

为了提升社交化阅读的效果，读者不妨试着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培养个人的阅读素养和信息处理能力。这包括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做笔记的意识，在讨论中注重观点的原创性等。其次，提供在线阅读与分享交流服务的平台，也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创新社交化阅读体验。最后，社会各界可以共同努力，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创造健康、丰富的阅读环境，引导青年群体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阅读习惯。通过这些策略，可以有效提升社交化阅读的质量，使之成为一种更加积极和持久的文化趋势。

“阅读社交”的流行，既是技术进步使然，也是青年精神世界的一种发展。年轻人的热情参与，与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结合起来，可以为更多人提供更深层次、更全面的阅读体验。社交化阅读的前景值得期待，而要将美好愿景化为现实，需要社会对阅读文化持续关注、悉心培育。

以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盘和林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了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转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从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来看，生产力指的是劳动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能力。

在传统农业社会，诸如土地、用于劳作的牲畜等，是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要素。而新质生产力指的是新兴且高质量的的生产力，涉及领域新、范围广、技术含量高，其本质是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方式，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它的构成不仅仅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等传统生产要素和主体，信息、数据、网络、知识和技术等也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新质生产力具备技术新颖、科技含量高特征。尤其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涌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加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交叉融合的过程。

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质变与跃迁，可以理解成一种“非线性”的增长或“阶跃式”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这使得新质生产力能够在推动产业革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科技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在科技驱动和全球化的趋势下，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加速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还催生了不同领域间技术和知识的交叉

融合。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平台，生产要素的流动变得更加便捷，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更迅速、更准确的反馈，使得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科技进步引领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更是推动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革新，可以使经济增长朝着更加创新、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是高效能、高效率的生产力，有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加高效的资源利用，减少了对有限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给环境造成的负担。通过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以及优化管理模式和供应链，能够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中产产品质量。通过推广新材料、新能源的使用，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也能够得以发展转型，降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减少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物的排放。

此外，新质生产力还推动了产业间的融合与交叉创新，如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进而形成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搭建连接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桥梁，推动经济模式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向智能化、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模式转变。

随着科技创新的提速增速和高频产业的勃兴融合，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选择，以及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长远来看，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科技投入不足、产业基础有待强化、制度环境不能健全和人才储备有待提升等关键问题，经济发展需要以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法律保障为依托。当然，这一过程需要统筹协调政府、产业和研究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和关系。其中，尤其需要简化繁琐的政策和法规，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化准入，减少影响创新和投资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